

苗力田教授 纪念文集

谭鑫田 李秋零 编

序

时光如梭。不经意间,我们敬爱的导师苗力田先生离我们而去已经将近一年了。然而,我们至今仍然感到老人家并没有真的离开我们。先生的音容笑貌,尤其是先生不顾腰疾站在讲台上,有板有眼、分析入微、娓娓而谈的那种授课神态,依然生动地留在我们心里。

先生的一生是爱国爱人民的一生,是追求进步的一生,是爱智慧、尚思辨的一生。早在大学时代,先生就曾满怀抗日爱国热忱,投笔从戎,走上

抗日战争前线,参加缅甸远征军,为声名赫赫的飞虎队担任翻译工作。毕业从教后,先生又将毕生的精力奉献给西方哲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,成为新中国外国哲学史研究事业的开创者和建设者。尤其是改革开放后,先生不顾年老体弱,毅然主持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“七五”重点项目《亚里士多德全集》中文版的编译工作。先生在前所未有的学术热情推动下,呕心沥血,历时十载,终于在1997年使《亚里士多德全集》10卷本全部问世。随后,先生又力促《康德著作全集》中文版的编译项目启动。先生从教50余年,殚精竭力,耗尽心血,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西方哲学教学与科研专门人才。直到去世前两天,先生还参加了

他的两个博士生的答辩会。会后，先生还兴致勃勃地与人谈论着他下一步的计划。直到去世当天，先生依然在伏案工作。案头上摆着的，是《康德著作全集》中的一部译稿，刚好修改到最后一页。“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”，是先生为我国学术事业贡献毕生精力的真实写照。

2000年6月1日晚，刚刚送别了导师的历届弟子们聚集一堂，在悲痛的气氛中作出了编辑出版一部纪念文集的决定。这既是为了更好地缅怀恩师，记载下与先生共同度过的那段美好时光，也是为了记载下先生的谆谆教诲，在未来的岁月里自励自强。如今，在这部文集中共收集了二十余篇文稿。作者中既有与先生保持着终生

友谊的同窗好友，也有先生在不同时期结识的学界友人；但更多的，是亲聆过先生教诲的“苗门弟子”。遗憾的是，由于时间紧促、联系不便或其他原因，我们未能征集到所有对先生抱有怀念之情的人士的文稿，在此谨表歉意。在这二十余篇文稿中，大家从不同的角度回忆了在不同的时期与先生的共同经历。它虽然不是先生一生的全部，但从这点点滴滴中，也应能折射出先生的光辉。

先生是我们的导师，但他并不仅仅属于我们，而是属于整个学界、整个民族。先生是学界的伟人、民族的英才，又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教师、一个平凡的人。我们把先生的这些伟大而又平凡的事迹记载下来，献给学界，献给

世人，以缅怀这位“执教五十余载，砥砺学问，抚育桃李，德言功皆有不朽，乃成一代宗师”的老人。

这部纪念文集的出版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领导给予了极大的支持。对此，苗门众弟子感同身受，谨致深深的谢意。

谭鑫田 李秋零

2001年2月27日

目 录

序	谭鑫田 李秋零(I)
忆苗兄	
——五十四年的风风雨雨	唐夕华(1)
悼力田师兄	柳 荫(14)
哭力田	方龄贵(18)
悼力田	曹 悫(27)
仰望西天,遥拜益友	
——回忆与力田兄间的往事	邓兰儒(35)
回忆力田兄往事	赵德本 温振英(51)
忆苗公	朱德生(60)
往事追忆	梁志学(69)
六一送别苗力田老师感怀	李毓英(76)
悼念苗公	李毓章(77)
我和苗公的斯宾诺莎缘	洪汉鼎(83)
哲人虽逝,风范长存	刘大椿(89)
怀念苗公	安启念(92)
垂垂老者,成就一次辉煌	

——悼苗力田先生·····	陈 波(100)
仁者,我师 ·····	傅永军(113)
思辨者是快乐的	
——怀念苗力田先生·····	李艳辉(125)

怀念与反思

——兼谈如何向苗力田	
先生学习治学·····	刘放桐(129)
老师的“遗憾”·····	谭鑫田(140)
跟苗老师学古希腊文·····	徐开来(146)
回忆苗力田老师·····	余纪元(158)
我给苗先生做外事·····	冯 俊(167)
无尽的思念·····	李秋零(177)
“我们经历了很多事情”·····	颜 一(187)
苗先生的日历卡片·····	张志伟(203)
怀念恩师·····	孟根龙(215)
无尽的忏悔,永远的思念	
——追忆恩师的教诲·····	张 荣(221)
苗力田先生二三事·····	聂敏里(231)
怀念恩师苗力田先生·····	韩东晖(237)
悼念恩师苗力田先生·····	王东胜(242)

忆 苗 兄

——五十四年的风风雨雨

唐夕华

苗兄走了！我们相濡以沫几十年，现在他突然离我而去，怎不令我如坠入噩梦之中！由于几年来我恶疾缠身，自以为是个朝不保夕之人，于是对于一切都漠然处之，而没有好好在生活上照料他，反而累及他在繁忙教学工作之中来照料我，这种长期超负荷量的劳动怎不使他猝然而去？！哀哉！痛哉！悔之晚矣，晚矣！！！他还有那么多重要的事没有做完哪！苗兄的一生是辛勤工作、惠及他人的一生，对于他的一生，我应该说些什么呢？！

我们都是东北流亡的学生，苗兄先我三年，和我哥哥一起逃亡到了北平，我则是最后一批从富锦县逃进关内来的。我们逃入关内绝对不是为个人的什么目的，而是想着进关后考入学校，努力读书，成为有本事的人，将来收复失地，打回老家去！

我当时读初中一年级。在流亡途中带领个小女孩，困难之多可想而知。在同哥哥商讨时，苗兄坚决不同意把我丢在北平的亲戚家里，他说：“既然是九死一生逃出来，就不能再令她陷入日寇魔爪之中！多个人将来多份力量啊！”于是我由哥哥们带领着加入了平津流亡学生的队伍，逃出北平，一路由天津而烟台而济南，到达了南京。那时中山中学的高中部设在南京板桥镇，哥哥与苗兄均读高中。七七事变后初中部亦迁到那里，我就于此时考入了中山中学。

流亡途中不知经历了多少艰难。由天津所乘的海船（货船）年久失修而又超了重，原本是去烟台，但半途中却抛了锚，大家（全都是大中学生）不得不纷纷跳入海水里往岸边游去。我被哥哥驮在背上游到岸边，放在刚刚退潮的海滩上。

我那时因晕船一路呕吐不止，一天一夜滴水未进，一直是昏昏沉沉的。哥哥束手无策，还是苗兄坐在我身边，抚摩着我的头说：“别哭，也别想家，一切都会过去的！别害怕，有哥哥在什么都不要怕！……”渐渐地我在此起彼伏的流亡歌声中睡着了。天亮醒来时，东方旭日已升，海水在脚边汹涌着，海鸥在头上盘旋着，身上盖着苗兄的上衣，他和哥哥则彼此相靠向着东方坐在沙滩上，仰着头观望着初升的太阳。我站起来伸伸腿，抻抻腰，蹲下身去，一边用咸咸的海水洗洗脸，漱漱口，一边哼着“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……”。

记得我们经过山东“老吕庄”时，苗兄曾为民写过“万言书”。当时，国民党政府为阻止日寇南下决了“黄河口”。日寇没阻挡住，却把沿黄河一带全淹了。老百姓被水淹得房倒屋塌，农田成了汪洋大海，牲畜为水所漂走……哥哥们看到农民们的惨痛景象，个个义愤填膺，愤恨已极，便决定上“万言书”。“万言书”是苗兄执的笔，写了好几大张纸。

日寇在南京进行惨无人道大屠杀的前一个星

期，中山中学全校师生（连同老师的家属）逃出南京，经武汉、长沙到了湘潭。苗兄在此高中毕业后与同班同学八九人一起徒步穿过湘西，经历千辛万苦终于到达重庆，考入中央大学哲学系。1941年，中国远征军在大学招收四年级学生当随军机要翻译官，苗兄应征入伍，在中缅边境工作了将近两年，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。对于苗兄，这本是一段值得纪念的光荣历史，但在后来的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却成为“罪证”。苗兄为此饱受折磨和屈辱，但他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当年的选择。他毫无私心杂念，一心一意为了国家、为了中华民族，怎么会有罪呢？！

我于1943年入了重庆女子师范学院英语系，那时苗兄已是研究生毕业，当了中央大学哲学系的助教。抗日战争胜利后，1946年，我们跟随中央大学“复原”的队伍一起回到南京，住进中大的宿舍，室内家具是胡小石先生所送的一张双人床、一张课桌、两把木凳，还有他亲自书写的一张字画挂在床头墙上，可惜在“文化大革命”时被红卫兵毁了。在家没呆多久，我就去宜兴东

坡中学教书。而这时苗兄肾结核病复发，腰酸背痛，有时发烧。我本应在南京找个教书的工作，可以早晚照料他。但因当时从后方“复原”回来的许多机关学校人满为患，找工作相当不易，而苗兄不想麻烦他人，尤其不愿干送礼托人之事，于是我不得不到外地教书。我表示不愿意去外地，他很严肃地说：“咱们是从家乡里逃出来的流亡学生，当初抱着为老百姓服务的雄心壮志，现在怎么能留恋个人的小家庭生活呢？外地更需要英语老师。”我无言以答，抹着泪离开了家，只有寒暑假里才能回家住上几日。

南京解放了，我回了家。苗兄为迎接解放奔走忙碌，和国民党特务周旋，因而病情更加不好，脊椎结核病到了晚期，终日高烧不退。后经中央大学附属医院动了脊椎固定手术，人就睡在石膏床里，整整三年。当时还没有实行公费医疗，人睡在家里，一切都须由自己料理。南京的夏天非常炎热，石膏床里外不透一点气，家中也没有降温设施。热得实在受不住时，我就用凉水浸泡的毛巾伸进去为他擦擦汗水，多擦几下也起按摩作用。但就是这样，苗兄也没有叫过一声

苦，相反看到我满脸的汗水，两眼的泪水，他却安详地说笑话，背古诗，讲故事安慰我。

当时刚刚解放，人们都去玄武湖畔绿草地上扭秧歌，庆祝解放。苗兄叫我也去参加。我放心不下他，就推托说没双像样儿的鞋袜，也没有件合身的衣服……苗兄却说：“那有什么关系，人不在穿戴上，在精神上！”苗兄啊，这就是你，你的一生始终都是这样，你从来没有被艰难困苦压服过，对生活也从来没有过多的要求。你的精神永远是积极的，从来都没有停止过精神追求。

那时，苗兄固定在石膏床上，身子一动也不能动，完全平躺着，却仍然不放弃学习和工作。他让我找了块平滑的木板，用它把书夹起来，仰着头看。累了，就放下来喝口水，喘喘气，接着再读。同时他还担负着中央大学哲学系本科生的教学任务，一周两次。学生们自带小板凳，围坐在床的周围听他讲课，一讲就是一上午。苗兄对自己就是这样严格，不能容忍自己浪费生命，总是渴求着精神的充实与进取。他是那么求知若渴。记得那时我参加了一个俄语学习班，每天早上六点起来，生好我们的“红泥小火炉”，做好

早饭（多半是煮粥，因粥可多放水，增加饭量），安排好一切，就赶紧到学校去听课。没过几天，苗兄对我说：“我也学。”我说：“怕我教不好。”苗兄说：“不怕，你学什么就教我什么好了。”就这样，我下课回来后又教他。两年的时间，我学得不是很好，苗兄却已经可以看俄语书了。

当时粮食是定量供应，月初我用个布袋去合作社把我们一个月的米买回来。有次背回来时，觉得米袋的重量和平时不一样，就告诉了苗兄。他叫我用家中的小秤称称，果然多了5斤。苗兄当即就叫我送回去。我犹豫着，很想留下来，吃几顿饱饭。苗兄见我没表态，马上严肃地说：“那是农民的，那是国家的，我们不应该吃的，赶快送回去！”我终于照办了。苗兄啊，你知道那时我多想把这些米留下来呀，但我知道你是对的，你一生为人就是这么坦坦荡荡，你绝不从别人那里多得一分一厘、一丝一毫，绝不做愧对人民、愧对国家的事！

现在回想起来，当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。那时的日子虽然很艰难，但我们的生活却是充实的，精神却是愉快的，对未来满怀着希望，相信

前途充满无限光明！

1952年秋，全国高校进行院系调整，他被调到北京大学。那时他刚从石膏床里下来，尚不能行走，由担架抬着上火车，到北京时是由北大的救护车拉进中关园宿舍的。之后不久，他就坚持去听苏联专家的课，每次都是用人力车拉着进学校，经过未名湖边去哲学楼听课。雨天路滑，我就跟着去以防万一，经过斯诺碑前都尊敬地行注目礼，记起他的《西行漫记》那本有名望的书！

我们由南京到北京，由北大而人大，无论去哪里，苗兄都没有推延过，让去哪儿就去哪儿。并不是因为苗兄听话，而是因为他从来没有为自己考虑过。他一心想的就是工作，就是想为国家、为社会、为人民多做点儿事。我们的后半生都是在北京度过的，这在别人看来可能很不错了。但是，就连这也是苗兄从来没有考虑过的。他从来没有想到会在大城市的名牌大学里当教授、教书。这不是假话。因为，在大学毕业的时候，他就曾经动员过几个同学，想一起去农村教书，只是由于后来参加了远征军，这个理想才没

有实现。他真地从来没有考虑过自己，更不用说向国家为个人提出过什么特殊要求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时，他已来到人民大学多年了。因为在中国远征军中做过翻译官的事情，他被打成所谓的“反动军官”，这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的。为国家、为民族的这么一件光劳的事情怎么就成为罪了呢？苗兄为此吃了不少苦头，但他从来没有怨言。

记得有一次开批斗会，苗兄陪斗，站了没多久就跌在地上。要知道他是六节脊椎骨固定过啊，平时拄着手杖连走路都不稳，现在要他弯腰低头（认罪），他怎么能支持得住？！而批斗的学生们认为他态度不好，便喝令搬来一张凳子，逼他站上去，当然又跌了下来。他们又把凳子架在桌子上去让他站着，当然又从桌子上跌了下来。一次比一次重。等到散会被抬回来时，苗兄身上已满身青紫无一好处。我赶紧跑到合作社买回两瓶二锅头酒，点燃了往他身上擦抹，擦了整整一天一夜，身上的瘀血才散开了一些（从此家中总藏有酒，以备不测之用）。当时我心里又是难过又是愤恨，但苗兄却没有责怪过，始终是以一种